

神州文化集成丛书

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

郑万耕著 方立天审定

新
出版社

神州文化集成丛书

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

郑万耕 著

方立天 审定

新华出版社

京新登字 110 号

神州文化集成丛书

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

郑万耕著 方立天审定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精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3 印张 插页 2 张 93,300 字

1992 年 2 月第一版 1992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6,000 册

ISBN 7—5011—1697—0/G·616 定价:2.55 元

序

李羨林

最近几年来，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，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，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，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，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。

根据过去的经验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，才算有效。因此，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东方影视集团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，爱国不敢后人，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，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，几经酝酿磋商，发起了这项《神州文化集成》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，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。计划先出一百本，并将配以电视录像。读者与观者，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，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；台湾在内，自不在话下；我们甚至想象，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

也都包括在里面。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，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视也感兴趣，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。“韩信将兵，多多益善”，这就是我们的期望。

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，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。在较短的期间内，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，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。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，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，无不慨然应允。为了保证著作质量，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。谁也没有“特权”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。这一点，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。

《神州文化集成》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《神州文化精华》或者《精粹》。但是有的同志认为，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，我们中华文化，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，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，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，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。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，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，但也绝非“毒品”，它似乎是中性的，绝对无害，也许还有点益处，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。基于以上的考虑，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《集成》。

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“神州”，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。

最近几年来，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。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，那就是，我并不囿

于神州这一个地区，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。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，其文曰“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十万里”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。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，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。但是，我看到了一些东西，想到了一些东西，我不愿意妄自菲薄，也不愿意敝帚自珍，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，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。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。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。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。

我觉得，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，往往就事论事，只就中国论中国，只就眼前论中国。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，摸不到全貌，摸不到真相。经过我多年的思考，我认为，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，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。所谓“大”指的是历史悠久、影响广被、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。拿这个标准来衡量，我发现了只有四个：中国、印度、伊斯兰和欧美。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，第四个属于西方。东西两大体系，有相同之处，也有相异之处，相异者更为突出。据我个人的看法，关键在于思维方式：东方综合，西方分析。所谓“分析”，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，越分越细。这有其优点：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。但也有其缺点：往往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。所谓“综合”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，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，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，既见树木，又见森林。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它

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。

我浅见所及，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。

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要想了解中国文化，必先了解东方文化；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，必先了解中国文化。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，了解必须同时并进，相互对照，相互比较，初时较粗，后来渐细，螺旋上升，终至豁然。

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。人们都知道，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，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，因此，诊断、处方、药材等等都不一样。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：西医常常是“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”，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，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。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，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，注意整体观念。

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。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，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，形态变化异常复杂，只看一个词儿，就能判定它的含义。汉语没有形态变化，只看单独一个词儿，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，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，它的含义才能判定。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，特别是汉族，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，习惯于整体观念。

再如绘画，中西也是不相同的。许多学者，比如申小龙先生等，认为西画是“焦点透视”，中国画是“散点透视”。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，可以步步走，面面观，“景内走动”，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。申小龙还

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，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。

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。约而言之，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。从“科学主义”的观点上来看，这未免有点模糊，但是这个“模糊”却绝非通常所谓的“不清不楚”，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，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。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“综合”，是完全一致的。

我的这一点想法，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。在北京召开的“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”上我讲了我的看法。会议结束以后，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，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。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，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，我又谈了我的看法，一位大概是主张“全盘西化”的教授说：“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！”我在大吃一惊之余，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，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。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。

但是，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，我毕竟不精于此道。亿而偶中，是可能的；亿而不中，又何尝不可能呢？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，无法用实践来证明。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，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。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同意的。

一个人自己有了点新的看法，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，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。得到赞

成，当然高兴；得到否定，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。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，像一个传教士一样，一有机会，就宣传我的“上帝”。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，再絮叨一遍。

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，我绝无意强加于人。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。百家争鸣，我只是一家。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，看中国文化，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，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，才能看得清楚。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，囿于积习，墨守成规，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，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。弘扬中华文化，发扬爱国主义，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。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，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。我希望，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；我希望，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。是为序。

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

目 录

序	季羨林
引言	1
一 明清之际的时代特征	2
二 三大思想家的精神气象	5
第一章 黄宗羲	9
一 黄宗羲生平	9
二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	17
三 黄宗羲的科学精神	22
四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	28
第二章 顾炎武	35
一 顾炎武生平	35
二 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	44
三 顾炎武的鬼神观和对世俗迷信的态度	53
四 顾炎武的哲学思想	56
第三章 王夫之	69
一 王夫之生平	69
二 王夫之的社会政治思想	81
三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	91

四 生化论.....	108
后记	李生泉 129

引 言

几千年来,古老的中华大地,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圣哲贤俊、豪杰英烈。中华民族凭着自己的勤劳、智慧、勇敢与深沉,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化,书写了壮丽的历史篇章,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。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,它昭示着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和希望。

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前二世纪,我国春秋战国时代,百家争鸣,诸子蜂起,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空前繁荣的局面。当时产生的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周易》等著作,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,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,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视和推崇。直至十七世纪,明末清初,中国出现的一批具有启蒙意识的思想家,他们在思想上的贡献、学术上的成就,和欧洲宗教改革、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成果相比,也是毫不逊色的。其中,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三人,批判地总结了宋明以来的思想文化,启示了近代人的思维方法,开创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学术文化,更值得我们研究和继承。他们鼎足而三,在我国历史上并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。

一 明清之际的时代特征

明末清初,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又一大变动时期,即黄宗羲所说的“天崩地解”、王夫之所谓“天崩地裂”的时代。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,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,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其主要表现是:

第一,自明代中叶的嘉靖、万历年间(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)开始,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,生存和发展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结构,发生了内部的“裂变”。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,冲击和破坏着传统的自然和经济结构。此种情况,以嘉靖末至万历年间最为显著。据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三十二引《歙县风土论》说:

迨至嘉靖末、隆庆间,则尤异矣。末富居多,本富益少。富者愈富,贫者愈贫。起者独雄,落者辟易。资爰有厉,产自无恒。贸易纷纭,诛求刻核。奸豪变乱,巨猾侵牟。……

迄今三十余年则更异矣。富者百人而一,贫者十人而九。贫者既不能敌富者,少反可以制多。金令司天,钱神卓地,贫婪罔极,骨肉相残,受享于身,不堪暴殄。

这里所说的“本”,指自然经济;“末”,指商品经济;“奸豪、巨猾”,指富商大贾。这是说,商品经济迅速发展,金钱货币开始支配整个经济命脉,以至财产日益集中,阶级逐渐分化。与此同时,手工业尤其是江南纺织业也在不断扩展,“有力者雇人

织挽”，逐渐形成了许多市镇。以苏州为例，“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，机房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，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。”（《明实录》神宗卷）苏州织工，“什百为群”，“延颈而待佣用”。“若机房工作减，此辈衣食无所着矣。”（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考工典》卷十）出现了“机房出资，机工出力，相依为命”（《明实录》神宗卷）的新型生产关系，即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。明代著名短篇小说《醒世恒言》中，就描述了江南盛镇一个施姓户主举办丝织工场的情况。三大奇书之一《金瓶梅》描写的主人公西门庆，就是一个新兴商人的代表。他“开四五处铺面，缎子铺、生药铺、绸绢铺、绒线铺，外边江湖上走标船，扬州兴贩盐引，东平府上纳香腊，伙计主管约有数十”（《金瓶梅词话》六十九回），来往于杭州、湖州、松江、扬州、南京与清河之间。这段描写，充分说明当时手工业繁荣和商业贸易的活跃已达相当水平。与此相联系，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城市工商业者阶层，或称新兴市民阶级。他们要求发展工商业，要求减轻或取消封建主义的超经济剥削，这样就和传统的封建势力，如皇帝派出的税监、矿监，形成日益激烈的矛盾和冲突。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、生长并和封建经济结构发生冲突的时期。

第二，明代后期，政治极端腐败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，并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。明朝末年，朝廷大权掌握在宦官集团手里，他们专权跋扈，残酷迫害正直的官员，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。同时对工商业者和广大农民横征暴敛，巧取豪夺。这样，一方面，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，有名的东林党人“六君子狱”以及后来“联络呈越俊秀”的“复社”的出现，就是这类矛盾的典型反映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东林党

人案引起了“士民”的反抗运动，如杨涟被捕，“都城士民数万，拥道攀号，争欲碎官旗而夺公”（《明季北略》卷二）；周顺昌被捕，“士民夹道”抗议，“郡中士民送者数万”，“百姓执香伏地，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”（同上）；黄尊素被捕后，“一招而击者云集，遂沉其（锦衣尉）舟，焚其衣冠，所得輜重，悉投之河”（同上）。可见统治阶级与城市市民的矛盾已激化，同时与广大农民的阶级矛盾更是日益尖锐，终于造成了此起彼伏的市民暴动，最后爆发了张献忠、李自成等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推翻了昏暗腐朽的明王朝。

与阶级矛盾相交错的是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。时期中后期，东北的女真族（后称满族）迅速壮大起来，先后建立了后金政权和清政权，形成了对明王朝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。在李自成农民军攻下北京，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，满族统治者与明朝的官僚大地主相勾结，乘机大举入关南下。清统治者实行民族征服和野蛮的屠杀政策，“扬州三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，就是清兵血腥暴行的显著事例。从而激起了以汉族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武装抗清斗争，一部分明代政权的残余力量，中小地主阶层中的部分人士，也投入了抗清复明的斗争。历经三十多年，清王朝才以武力平息了各族人民特别是江南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。清圣祖玄烨（康熙）掌权以后，采取了镇压与笼络相结合、发展生产与思想控制并重的政策，成功地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。

第三，西方文化的传入，客观上为中国的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，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开始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时期。自从葡萄牙人斯科·达·伽玛于一四九八年发现东方航线以后，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者、商

人、天主教传教士从一五七九年(万历七年)开始陆续来到中国。他们在对中国进行掠夺和侵略的同时,也传播了西方文化。传教士们在宣传宗教的同时,输入了天文历算以及实验科学、哲学、心理学等西洋文明。利玛窦和汤若望为其代表。他们与当时的知识界有着广泛的交往。如李贽、徐光启、李之藻、杨廷筠都和利玛窦等人相友善,黄宗羲也和他们相识。到了明末,所谓“泰西文明”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的时髦学问。方以智的《物理小识》,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,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,梅文鼎的算学翻译,以及李之藻的《名理探》的翻译,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初期欧化思想。就连集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之大成的王夫之,也不能不赞叹西洋科学的“巧密”。西学东渐,中西文明交接,造成了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形势,同时也为中国的古代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在这样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背景下,明清之际的学术界、思想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,逐渐形成了一股带有鲜明的人民性、民主性、实用性、具有启蒙意识的时代思潮,而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三位大师就是突出反映当时时代之潮的代表。

二 三大思想家的精神气象

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环境,产生了特定的时代思潮。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三大家,虽然出身不同,经历各异,但他们的道德人格、思想意识和政治主张,却具有共通的特点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第一,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。所谓爱国,其主要内涵就是

爱自己的国家，保卫自己的国家主权。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伟大诗人屈原，气节不辱的苏武，民族英雄岳飞、文天祥等等，就是我国历史上家喻户晓、老幼皆知的优秀代表。我们这里所说的黄、顾、王三位大师，是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思想家。虽然顾炎武出身于大地主家庭，黄宗羲、王夫之出身于小地主阶级家庭，但是，当国家危急，人民备受统治者的屠杀、摧残和欺凌的时候，他们奋身而起，同仇敌忾，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，英勇地参加了保卫国家的抵抗斗争。黄宗羲倾全部家产，招募义勇，组织“世忠营”；顾炎武发动江南吴江起义，后又在西北等地秘密组织抗清活动，整整三十七年，坚持不懈；王夫之也曾举兵起义于衡山，后窜身徯洞，“完发以没”，“虽死不辱”。他们都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，企图拯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虽然他们的活动失败了。但是，他们始终坚持高尚的民族气节，不与清统治者合作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，依旧著书立说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传播进步思想，号召人民团结奋斗。这种精神是值得人民纪念的。

第二，对旧制度的批判精神和启蒙作用。明政权的覆亡，给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人以莫大的打击。他们探寻王朝覆灭的原因，提出了对于君主专制主义的深刻批判。黄宗羲写了《明夷待访录》一书，对封建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抨击，宣布君主“屠毒天下之肝脑”，“敲剥天下之骨髓”，乃“天下之大害”，并初步提出了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思想。顾炎武读了此书，推崇备至。顾氏的政治思想原则多与黄氏相合。他的许多著作，鲜明地揭露了官僚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，赤裸裸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，为农民发出了正义的呼声。王夫之的《黄书》、《噩梦》更对农民所受的压迫，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抗